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不論「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現已是個合而為一的時代名詞。目前多數的學者會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一名詞，來統稱 1915 下半年到 1920 年代末這十餘年間的中國社會劇變。只是，在此種分期下，出現了一個筆者認為值得探討的問題，即這兩階段的新文化運動推廣，向來認為是以知識分子及學生在當中扮演最關鍵的角色。然所謂關鍵，又分可分為核心（centre）與外圍（periphery）兩個社群（community），知識分子一向被視為核心，而學生則被視為外圍。⁰¹ 此種核心

01 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江政寬譯，《歷史學與社會理論》（臺北：

與外圍的探討方式，源於社會學研究上的論點。早期以涂爾幹（Emile Durkheim）、韋伯（Max Weber）這類代表性的社會學大師為首，學者們在研究某一社會體系時，主題都會針對當中的核心結構來探討。然近期西方人文學者，對於在同一社會下的外圍結構，其扮演的角色越來越有興趣，甚至會有論者以為目前所認定的外圍，在該社會體系的重要性其實是超越了核心。而西方社會學、經濟學中，更有不少對特定地區、人物、族群的研究，引用這類的論點。⁰²

近期在歷史研究中，也陸續有學者採用這類的觀點來重新詮釋歷史。例如在研究現代史的華人學者中，羅志田先生就曾在其研究裡，藉探討清末民初社會的思潮流變，從中看社會核心的轉移。從其研究中，更可看到當時中國對社會精英的定位，逐漸由傳統的「士」、變為西化教育的知識份子、乃至學生和工人階層的過程。他的探討，正運用了核心與外圍重新詮釋的概念。⁰³除羅志田外，像余英時、王汎森等知名的學者，更曾在其研究中，嘗試透過這類詮釋外圍與核心間孰輕孰重的做法，重新探討外圍份子或地區的重要性及其社會地位的流

參田出版社，2002年），頁169-177。

02 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江政寬譯，《歷史學與社會理論》，頁169-177。

03 羅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國：清末民初思想詮釋與社會權勢的轉移及其互動關係〉，《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臺北：東大圖書，1998年），頁149-192。

變，並賦予一套不同的歷史詮釋。⁰⁴而這類論述方式，是在早期研究中未曾被人運用的。

回頭來看現階段跟五四新文化運動相關的研究，普遍的定見，多認為「五四」前站在核心的社群，是文化界中的新知識份子。而對於這類新知識份子的認定，泛指已出社會，在出版、教育、學術界用生產知識來謀生的文化精英。而學生社群，因在這時期看似屬知識上的「消費者」（customers），所以目前對這時期新文化運動的探討，就未將研究焦點鎖定於他們身上。即，對於學生在「五四」以前地位的認知，在研究上多被歸類於在外圍而非核心。而他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影響力，是在「五四」爆發後才被肯定。在「五四」後，學生才被視為是社會上獨領風騷的群體。而「五四」後，雖文化精英持續有所作為，但在新文化運動的推展上，其社會地位反被這些學生所超越。⁰⁵

04 余英時，〈中國文化及其思想史的背景〉，《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臺北：三民書局，1995年），頁166。王汎森，〈反西化的西方主義與反傳統的傳統主義——劉師培與「社會主義講習會」〉，《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年），頁221-239。

05 這種看法，可能多少跟有著親身經歷的胡適，他的回憶有關。胡適認為「民國八年的學生運動雖與新文學運動是兩件事，但學生運動的影響能使白話的傳播過於全國，這是一大關係；況且『五四』運動以後，國內明白的人漸漸領悟『思想革新』的重要」，讓中國國內反對聲浪變小，而「因此，民國八年以後，白話文學的傳播真有『一日千里』之勢」。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二）（台北：遠東圖書，1968年），頁255-256。

然而，這種普遍的劃分方式，筆者認為是有待商榷的。特別在這種論述框架下，學生在「五四」前好像毫無社會影響力及作為可言，在新文化運動上更未建立一套自我的理念，僅為同時代各家思想上的跟隨者。事實真的如此嗎？若那個時期的學生如此不堪，相信當時屬於師長一輩的胡適（1891-1962）在後來回憶時，也不會自稱其 1917 年剛進北大任教時，深覺很多學生學問都比他強，讓他不得不提心吊膽而加倍用功了。⁰⁶

此外，學生能使五四運動對社會造成如此大的迴響，造就出這種全國性的影響力，過程實無法一蹴可及。筆者認為，須先透過一段時期的提升，來滿足某些與之相符的環境條件。這種提升的過程，並符合了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討論如何使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移植成為共同價值觀時，所提出「逐漸覺醒的」（awakening）之觀察方式。⁰⁷

06 這是胡適在抗戰勝利後第二年，紀念北大校慶演講上所提到的內容，而羅家倫也轉述過這段內容。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逝者如斯集》（台北：傳記文學，1967年），頁165。此外，程滄波（1903-1990）的回憶中，更點明這時期學生輩如傅斯年者，同時期的學識是絕對超過胡適的。他認為「論到『五四』時代的人物，陳獨秀胡適之與傅孟真，見解智慧，陳傅都超過了胡，可是胡對他們有相當的化導作用。……世間所說傅是胡的大弟子，那是錯誤的，如果論思想見解，若說傅是胡的大弟子，那是青出於藍了」。見程滄波，〈記傅孟真〉，載於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臺北：文星書店，1963年），頁16-17。

07 班納迪克·安德森在談論 18、19 世紀歐洲及美洲的民族主義風潮時，先以芬蘭為例，說芬蘭最早使用的語言和文字是俄語和拉丁文、瑞典文，然在以處理文字為專業的人士（作家、律師、教師等）帶領下，逐漸改

加上現有清末民初的相關研究中，雖已有很多著作重點是討論學生在社會變遷中產生的作用，⁰⁸然針對學生社群在進入民國至「五四」前這段時間在社會上的探討，卻未有任何的研究成果。對於還原學生族群在清末民初社會變遷上的探討而言，無疑是出現了一大斷層。因此，有必要從這個時間點切入，

變一般民眾在知識上的消費習慣，並使芬蘭民眾開始重視自己的母語及文字，進而讓芬蘭的民族主義意識抬頭。同時他也以這個論述作為基準，探討丹麥、挪威這兩個北歐國家民族意識的崛起。並借用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談法國大革命的論述來定調，認為某些事件的發生之所以有爆發（不論成功與否），最初是參雜各種理念，而這些空想的理念透過印刷、出版實體化後變成一種「概念」（concept），而當概念的發展已達成熟的時機，最後就會成為一種模式爆發出來，且後人也無法質疑「此存在性」（it-ness）。而筆者認為若用他的觀念，頗有助於從另一種角度來重建此時中國社會變遷走向之因。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時報文化，1999年），頁84-90。

08 像桑兵曾有專著討論清末學堂和學生在社會變遷中的地位。桑兵，《晚清學堂與社會變遷》（臺北：稻禾出版社，1991年）。而針對民國之後的討論更是多元，焦點也全擺在「五四」後學生在社會變遷上的影響力，有談論學生對於「五四」後新文化運動發展上的各項影響，也有探討後五四運動時期學生在中國社會變遷中扮演的角色。在這類研究上，周策縱、彭明、舒衡哲（Vera Schwarz）、華志建（Jeffrey N. Wasserstrom）、呂芳上等前輩學者的經典著作，都有相當重要的研究成果，而對「五四」後對於學生社群與社會影響的研究，時間更可拉長至 40 年代末期。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彭明，《五四運動史（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舒衡哲（Vera Schwarz）著、劉京建譯，《中國啟蒙運動——知識份子與五四遺產》（臺北：桂冠圖書，2000年）。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Jeffrey N.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來探討學生社群在社會變遷上的作用，如此才能更深入瞭解學生社群在清末民初的社會變遷上，佔有何種的重要地位，此即為筆者著這篇文章的動機。

二、研究目的

在學生社群之中，最能產生號召力的一群，絕對非大學生莫屬。以中國近現代幾次學生主導的全國性社會運動為例，不論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以及 1980 年代末的六四運動，學生中的核心，其身分都是大學生。當年胡適甚至還對這種動輒由大學生主導社會運動的現象，提出了一套歷史解釋：

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裡，政治太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幹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由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⁰⁹

胡適口中的青年學生，跟郁達夫（1896-1945）所言「配舉起第一塊石頭來的人」的青年定義大抵相同，年齡都是二十歲上下，¹⁰ 而這個年齡層的學子，多半是大學生身分。只是，

09 胡適，〈為學生運動進一言〉，《獨立評論》第 182 號，1935 年 12 月 22 日。轉載於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2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410。

10 郁達夫，〈學生運動在中國〉，《郁達夫全集》（7）（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年），頁 59。

大學生為何每每都能成為學生發起的社會運動中的領袖？筆者認為這絕非巧合。教育制度的分層方式，或許是產生此一現象的主因。

從整套教育制度來看，由於教育制度的設計，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制度，使得在這套教育制度裡象徵最高處的大學，其教育內容最龐雜（種類多樣且精細）。因此，大學生所受的教育，和小學生、中學生相比，其內容與程度上，往往是最新且最深奧的。也就是說，這種教育結構的定位，讓大學生無可避免地成為學生社群中的金字塔頂端。所以，一旦有以學生為骨幹的社會運動爆發時，大學生往往就會成為當中的領袖。¹¹ 故，在探討這時期學生社群與社會變遷的關聯時，筆者將討論焦點鎖定在大學生身上。

又，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北京大學被外界視為是這場運

11 這裡筆者借用了霍布斯邦的論點，霍布斯邦在談論 1830 到 1850 間歐洲民族主義發展，及法國 1848 年的革命所造成的風潮時，特別探討了此時期大學生所具備的社會地位。他說當時全歐大學生，在 1848 年 2 月革命時的總數雖僅有 4 萬人左右，然卻在這場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引領了一股風潮。並分析這種現象是「中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先鋒，沿著教育進步的路線在戰鬥，而教育進步，則顯現在大批『新人』進入當時仍被少數精英占領的領域。學校和大學的成長顯示出民族主義的進展，因為尤其是大學，正是其自覺的鬥士。……而且即使人數沒有成長，社會和大學的變化，也為學生賦予了一種社會團體的新意識」。若用霍式的論點，套在這時期中國大學生的身上來觀察，似乎也頗為吻合。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著、王章輝等譯，《革命的年代 1789-1848》（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 年），頁 197-198。

動中的指標地。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北京大學都是當中的關鍵。如發起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多在北京大學任教，「五四」也是在北大學生的率領下才爆發的。為此，有必要探討北大學生在「五四」前在新文化運動上的參與，從而看出他們在社會上逐漸累積影響力的過程。筆者並認為，藉此種探討方式，有助於還原五四運動以降，學生發起的社會運動，都有機會變成全國性質運動之主因。

知名學人呂芳上先生的專著《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詳細探討了「五四」後十年的中國學生運動，文中並找出學生運動的變質，從五四時期的學生社群自發性的發起運動，逐漸變成學生運動被政黨介入，成為政治上的一種工具。¹² 這種對於社會運動主導權轉移的觀察，是非常獨到的一種研究創見。呂先生觀察到的，是政治力量介入讓社會運動主導權改變。拙文則借呂先生的研究角度，來看新文化運動開始到「五四」爆發中間，社會運動主導權的轉化。筆者以為，北大學生在這時期，從最初的吸收新知，逐漸能認同並支持新思潮，到最後的積極投入，此過程是意識形態上的支持方向與態度轉化。即，一開始是師長輩的新文化運動發起者，帶入新觀念影響了北大學生，而學生在受到啟發後，陸續有人公開支持師長輩的觀念，並投身於相關的各項活動上，最

後並讓學生能在五四運動後，一躍變成社會運動上的主角。這種過程，更足以說明學生在五四運動前的社會地位，絕非單單只是外圍，他們的社會地位，已有向核心轉移的現象。也希望透過這種解釋角度，能和呂先生所研究的時代做個呼應，並稍微填補進入民國至「五四」前這段時間，學生社群在社會上影響力相關研究的不足。

為此，在探索北大學生在「五四」以前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為時，筆者想尋求一個比較能突顯學生作為的方式，即從這時期北大校內學生社團活動中，來看這時期的社團活動，與新文化運動發展上的一些關聯性。並從中看出這類學生為主的社團活動，能否在新文化運動中產生作用，以至於有助此運動日後的發展。基於這個想法，筆者選擇了北大校內同時代中名聲最響亮的新潮社，作為本文的切入點，這並為本文的研究目的。

第二節 歷來研究回顧

在目前與本文相關的研究中最具直接關聯者，當屬李惠惠小姐在 1985 年著成的碩士論文《新潮雜誌與五四新文化運動》。¹³ 其著將新潮社的主要成員、活動、主張及在五四新文

12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頁 27-30。

13 李惠惠，《新潮雜誌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年）。

化運動中的影響力，做了較有系統且具體的介紹。而對於想瞭解新潮社詳細狀況者來說，她的著作是一本頗具研究成果的專書。惟此研究是在二十多年前發表的，論述方式比較傳統，就是平鋪直敘的記載整個社團的流變。在目前研究方式越來越多元的情況下，對於新潮社的相關討論，是可用更多元的角度來研究。加上此著當時探討新潮社的活動及影響力，焦點多放至「五四」以後的時空討論。而本文探討的重心則放在「五四」之前，所以在研究上，筆者將會有不同的詮釋方法。

其餘歷來諸多學者所涉及的部分，因相關著作繁多。在此，筆者僅將相關研究，略分成以下三種類型來作簡介：

第一，是通論性著作。在 1949 年以前，已有不少學人對五四新文化時代撰寫過一般性的介紹，如陳端志的《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1935 年出版）、包遵彭的《五四運動史》（1946 年再版）等都是這時期通論性著作的代表，¹⁴ 然這個時期對於五四或是新文化運動的討論，僅止於史事介紹，沒有更深一層的分析，因此不能稱作是真正專門的一種研究，因此，現在學界更多將 1949 年以前的這類著作，當作是參考史料在運用。

1949 年以後，這類的通論性著作，開始了有系統且專門的研究方式。其中與本文相關且最具代表性的兩本著作，即

14 陳端志，《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臺北：古風出版社，1986 年翻印）。包遵彭，《五四運動史》（南京：青年出版社，1947 年）。

周策縱先生在 1960 年在美國以英文所寫的《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英文原名為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和大陸學者彭明的《五四運動史》。

《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開啟了中外學者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的熱潮。在此著作中，周策縱徵引了許多豐富的材料，透過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外交等多個面向，交互探討五四運動的內涵，並從中看出中國在 1915 年至 1920 年代末期的社會變動。其中，周策縱在這時期對新潮社和北大學生的觀察，是稱北大學生是「受《新青年》教授們的啟發，……從而變的更積極支持新思想運動」，且「新潮社的成員們便是其先鋒」，所以，響應新文化運動的北大學生，就因成立新潮社，與發起新文化運動的師長輩取得結盟的關係。¹⁵ 從周策縱的分析裡，可看出他對「五四」以前的學生，是定位在響應新文化運動的外圍團體。而此著作問世後，後來在華人學術圈中更有好幾種不同的譯本，可說是現階段最具有代表性的五四通論性研究。¹⁶ 並開啟了中外學者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研

15 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68-75。

16 如台灣部分，楊默夫就曾將周策縱此著翻譯成專書。另如周陽山也曾收錄了鍾玲、王潤華在香港《明報》月刊上的譯文，加上其他學者的著作合編成《五四與中國》，而桂冠出版社也於 1988 年重新翻譯了周策縱的著作。見周策縱著、楊默夫譯，《五四運動史》（臺北：龍田出版社，1980 年）。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臺北：時報文化，1979 年）。

究的熱潮。而在周的著作問世後，中外也逐漸出現一些類似周策縱這類的通論性研究。當然研究的著眼點不盡相同，然他們對於學生的定位，多少都受到周策縱的看法所影響。

其中，大陸學者彭明的《五四運動史》，其著作結構就與周策縱的作法最為相仿。彭先生的著作中，則把「五四」事件當作全書中心點，談論「五四」前後十年中國在社會、文化上面的劇烈變動。而一如周策縱，彭明也大量運用了經濟、教育、出版方面的材料，來說明他想陳述的看法。但或許是受限於成書年代較早，兩岸政治氛圍仍壁壘分明的關係（此著是1984年初版），文中的觀點或結論，都強烈反映出其本人或所信仰的政治意識形態。¹⁷ 例如，彭明談論新潮社，在「五四」前的定位時，就言「它（按：新潮社）仿效《新青年》，鼓吹『倫理革命』」、「它仿效《新青年》，鼓吹『文學革命』」，他更說新潮社的成立，是「以胡適為主編的《新青年》為榜樣」，因這層關係，他斷言在「五四」後「新潮社的絕大多數成員，就迅速地向右轉了」。¹⁸ 然而，若去掉政治意識形態的問題來

桂冠圖書編譯，《五四運動史》（臺北：桂冠圖書，1989年）。在大陸方面，周子平等人在1996年的譯作，內容似乎又比早期台灣所翻譯的更為完整，且在書名定題上也較忠於原著。所以，筆者在正文中的中文定名，是採用了大陸方面這次的翻譯本名稱。見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近期尚有嶽麓書社，於2001年翻譯此書，定名為《五四運動史》。

17 彭明，《五四運動史（修訂本）》。

18 彭明，《五四運動史（修訂本）》，頁225-227。

看待此著作，該書內容仍對這時代的各面向作出較為細部的介紹，並可跟周策縱的著作成果互相對照。只是，從他的言論中仍可看出，對於學生在「五四」前的定位，其也跟周策縱抱持類似的看法，認為學生在「五四」前算是社會運動中的外圍參與者，不屬於核心的位置。

而1949年以後，這類的通論性著作尚有許多。然通論性著作的問題，在於其僅能概略陳述五四新文化時期的各面向。所以，雖用了很多材料，也提及學生在五四新文化時期社會上具有重要影響力，然無法選擇單一向加以深入且詳細的介紹。且也無法從這些研究中，看出「五四」前的學生在社會上是否也具備同等影響力。加上筆者對於「五四」前學生的定位，與周策縱、彭明的觀點有所不同。所以，相信本文對於新潮社的探討，會有別於這些前輩學者的定論，而有不同的詮釋。

第二，是探討北大改革的研究。這類的研究，並成為近期中外學者喜歡採取的詮釋角度，藉由探討北大校園改革，進一步找出與新文化運動聯結的關鍵點。這種方式大約在1980年代開始有學者使用，初期西方學者像波什威克（Sally Borthwick）的研究，是在研究清末民初社會思想變遷時，透過探討學校教育的改革，兼論及北京大學等高等學校的改變，最後找出校園改革和社會變遷間的關聯性。¹⁹ 後來逐漸有學者運

19 Sally Borthw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The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Era*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3).

用這種方式，來探討北京大學對新文化運動發展造成的影響。如葉文心的著作可為代表。²⁰

葉文心探索 1919 年以後中國現代化學院與社會變遷中的關係時，也曾提到北大的改革對學生的影響。不過，她的研究重心，是放在當時全中國逐漸形塑出的抽象校園風氣改變，及在社會變遷中所起到的作用。因此，在探索這個問題時，會談及學生如何讓自己去引導社會風潮的過程。此外，她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學生的探討，更是放在與 1930 年代學生自我的定位比較上來談。所以，她關懷的焦點並非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

其他研究涉及北大改革與新文化運動關聯的著作中，還有學者會把研究焦點，著眼於校園體制或學科教學的改革，如陳以愛、劉龍心等學者的著作即為代表，並都有相當好的成果。²¹而新一期的研究裡，仍有韋斯頓（Timothy B. Weston）、林小青等學人，就北大改革與時代變遷相連，陸續發表其研究成

20 Wen-Hsin Yeh (葉文心),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1 陳以愛的研究，是側重於北大國學研究所成立與轉型的探討，並從中找出這個體制改革，所帶動出的現代學術研究機構型態。而劉龍心則是藉由探索現代中國學術體制的轉型，來找出現代中國史學體系的建立，當中也曾探討到北大史學系的改制，及其對當時中國學術研究風氣上造成的影響。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9 年）。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社，2002 年）。

果。²²

不過，這類將北大改革與新文化運動發展作連結的研究，仍有其不足之處。最大的缺憾之處，在於對北大學生在「五四」前校園內外的作為，敘述相當有限，學生的作為與社會變遷的關聯，要到「五四」爆發後才有充足的敘述。換言之，這類研究似乎仍將「五四」前的北大學生，定位為單純的被動接受校園改革。可能是受前文所述目前學界對當時出社會知識份子與學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角色劃分上的普遍觀點影響，因而出現這種論述基調。所以，筆者認為這部分還有再加以探討的空間。

另外，限於這些研究本身設定的主題範圍，在這範圍外的部分，這些研究也無法加以多做描述。如陳以愛的研究重心，是放在 1922 至 1927 年的北大學制改革，其擷取的時代已是在「五四」以後，因而「五四」前北大學制改革與新文化運動發展間的探討就著墨有限。劉龍心的著作，關懷的層面則更多放於探討全中國史學體制的轉型及學科專業分門的建立上，相對於此，對於探究北大改革下的學生，他們在「五四」前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也不多。而近期韋斯頓與林小青的著作，其談

22 Timothy B. Weston, *The Power of Position: Beijing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898-1929*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Xiaoqing Diana Lin (林小青), *Peking University: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Intellectuals 1898-1937*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論重點則不約而同的放在外部社會環境，對於北大校園轉變的影響，韋斯頓的切入重心是社會上的政治思想氛圍為主，林小青則多把焦點聚集在文化跟西方思潮的傳入校園，造就北大轉型。相形之下，對於北大所帶動的社會變遷風潮反而描述較少。因此，筆者認為目前談論北大與新文化運動發展的著作成果雖多，然這些研究成果都尚有不足之處，對於專論北大與新文化運動發展內容的研究方式上，本文應可稍微彌補目前這部分研究所缺少之處。

第三，則是討論新文化運動的內涵。由於這類研究新文化運動內涵的著作，討論眼光會放在新文化運動推廣時，其精神的認同者之意見。因此，屬於新文化運動核心的北大人，他們在這期間呼應新文化運動精神的內容，就會被提出來探討。而在這種研究方式下，學生在當中產生的作用，也有被拿出來討論的空間。例如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著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²³

舒衡哲在其著《中國啟蒙運動——知識份子與五四遺產》一書中，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視作類同於西方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的類型。在此一主軸下，內文討論了受師長輩啟蒙的學生，在這個時期與老師的互動，以及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的成就。而對於這批學生的看法，她即言這些學生，

23 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劉京建譯，《中國啟蒙運動——知識份子與五四遺產》。

除是受到《新青年》師長輩啟蒙，還加上自身所受傳統教育，而成為新舊文化交流中的「受益者」。這種特殊的背景，造就了他們在五四運動時期的社會地位。

另外，像李澤厚的著作裡，將五四新文化運動定位為啟蒙和救亡的變奏。²⁴ 又如陳萬雄，則探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清末民初改革精神間的延續面向。²⁵ 而他們的著作中，也多少涉及學生在當中的作用及其支持轉向。

但此類的研究模式，對於學生的作用性探討，會顯得較為片面。如舒衡哲的觀點是設定了啟蒙的觀念，因此在探討學生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作用性上，就談論學生在接受啟蒙到自發去想推動新啟蒙的轉折，然一些可能是學生自主觀念而非受啟蒙影響的活動，他並未多做分析。而李澤厚的重心，也是放在知識份子在啟蒙與救亡兩個訴求間的抉擇，探討學生及知識份子的活動，反而只是用來佐證其論述的過程，內容比重相對來說就不多。因此，筆者相信，對於新潮社的討論，本文與這些研究成果相比，應能補足這些前輩學者論述有限之處，並可跟他們的研究成果做個銜接。

24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

25 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

第三節 章節安排與資料運用

一、資料運用

本文主要使用的資料，是新潮社所發行的《新潮》雜誌。特別是針對該雜誌第一卷（1號到5號）的內容，來分析該社自身的主張外來分析該社自身的主張。

又由於北京大學新潮社的成員，如傅斯年（1896-1950）、羅家倫（1897-1969）、康白情（1896-1959）、俞平伯（1900-1990）、顧頡剛（1893-1980）、毛子水（1893-1988）、楊振聲（1890-1956）等北大學生，日後也多是各界的名人，並在中國現代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²⁶ 因此，坊間目前有不少相關的回憶錄、文集、年譜、甚至日記都已整理出版，而這些筆者都會在本文中加以運用。

另外，在本文中，筆者也多參考了同時代的相關報刊，如《北京大學日刊》、《新青年》、《晨報》、《每週評論》這類新潮社成員有發表過文章，或與新潮社活動有過接觸的報刊，從這些刊物中，來看「五四」以前新潮社的整體活動。並佐以輔助性質的彙編資料，來對新潮社和「五四」前新文化運動的發展關聯上，做個通盤性的整理。

26 新潮社社員在日後中國各界的經歷，李惠惠與周策縱的著作都做過簡介。

二、章節安排

在章節安排上，本文一共分為六章。除本章緒論和第六章結論之外，第二章是「新潮社的醞釀和成立」，內容主要談論了新潮社的成立過程。此章會先談及對於新潮社成立有利的時空背景變遷，也就是蔡元培（1868-1940）在1916年底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後的改革。之後並延續這個背景，詳細討論新潮社在1917年下半年醞釀，至1918年底成立中間的過程。

第三章「新潮社在「五四」的規章、社員和社務」，談論焦點則在於分析新潮社的相關規章、成員結構以及「五四」以前的所有社團活動，筆者希望透過這種討論方式，將新潮社的整體架構，及其在「五四」前的所有活動，作出有別於李惠惠的研究成果。

第四章與第五章是論新潮社在「五四」以前的核心關懷，特對新潮社其社團兩內在主軸「民主」與「科學」進行探討。藉「五四」前《新潮》雜誌及一些社員在其他刊物中所發表言論的整理，來看待這些社員的想表達的訴求為何。同時，也會引一些被視為新文化運動領導者在這期間的言論，與新潮社社員的主張相互對照。透過這種對照方式，來看出新潮社其主張所具備的特殊性，以及其言論對於新文化運動發展上的一些影響。

雖然，新潮社成立於1918年底，離「五四」爆發僅不到

7個月，而本文想藉由該社在這短時間內的活動，從而證明學生在社會地位上的迅速提升現象是很有限的。加上五四後社團仍持續運作3年多，至1923年之後社團才停止營運。²⁷若撇開「五四」後的作為不談，似乎無法把新潮社的整體活動完整呈現。但筆者相信，採用這種探討，還是能證明北大學生於「五四」前投身的活動，是奠定了他們在五四運動中一呼百諾的基礎。同時，筆者也希望藉著這種討論，能將清末至五四新文化運動間學生社群在社會變遷上的作用，做一個完整的銜接。

新潮社的成立始末

在胡適、陳獨秀於1917年初先後喊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後，新文化運動便正式邁向一個新階段。筆者認為，文學革命口號的宣示，在新文化運動內部同樣起到類似王汎森先生所言「轉轍器」的作用，讓新文化運動有更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⁰¹此一時間點，也正值蔡元培甫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又蔡元培在北大陸續所推行的改革，使得民初以來被外界視為老爺機構的北大，校風為之一新。而北大更是日後成為新文化運動推行者的陣營。所以，蔡元培在北大推行的校園改革，與新文

27 新潮社主要社務是以發行《新潮》雜誌，《新潮》雜誌最後一期（3卷2號）是在1922年3月出版。但在發行雜誌外，他們在社團後期社務中，還有人文叢書的編輯。所以，若加上新潮社在1923年才編纂完成的《1920年世界名著特輯》，他們真正停止社務運行的時間，當在1923年以後。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輯序〉，轉載於馮克立等編，《魯迅序跋集》（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586-603。

01 王汎森先生論這段期間整個大的中國全部環境的社會政治條件，造就出新舊文化得以遞嬗的可能性，並拿此種社會政治條件比喻為火車的「轉轍器」。筆者借用他的論點，認為若只談新文化運動本身，文學革命口號的提出，同樣對新文化運動後來的發展起到了「轉轍器」的效能。王汎森，〈思潮與社會條件——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個例子〉，《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年），頁241。